

许涤新 晚年的学术生涯



□苏辛涛

[苏辛涛, 中国社科院经研所干部。北京, 100083]

《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修定和出版

许涤新晚年主要是用来修定他以往在经济学上的代表作,即在30年代末,根据毛泽东关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指示准备写,却延至1949、1950、1954年才先后出版的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这部巨著出版后,不仅发行量很大,而且还被好些高等院校用作教材,但他仍要修改。因为他认为,这部旧著缺乏对国内外新的经济情况的评介,又有些经济史的论证同该书出版后新发现的文献不尽相符。

为修改这部巨著作好准备,许涤新在晚年首先致力于完成或完善以下三部与这部巨著部分研究对象相同的专著,即由他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和他的个人著作《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这些专著,也不全是他晚年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就是他一生中主编过的著作中花的心血最多、历时最长、又未能在他生前全部完成的著作。编写此书的必要性,是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提出的。1960年春,周恩来获悉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统战部在1958年已根据许涤新(当时任中央

统战部副部长、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等职)的建议,发文给有关党委,要求他们组织人力去调查、收集、整理中国的资本主义行业、企业史,写此书的任务交给了许涤新。但是,此书分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三卷的出版时间,却分别延至1985、1990、1993三年(按原计划,还有第四卷《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后来已移作《当代中国》丛书之一出版)。之所以会这样,根本原因当然是由于全书涵盖的历史很长、很特殊,问题很多;中国资产阶级又没有对其经营过的企业、行业留下应有的记载;从1958年开始对这种史料的调查、收集和整理工作,在“文革”中又被迫中断。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许涤新到经研所不久,把“文革”后为此书重建的写作班子也调到所里。开始进入编写阶段后,他除为编写组织人力、拟定规划与提纲,审稿极尽全力外,还对此书的内容设计和写作方法提出了极为严格的科学要求,并得到编写者的拥护和认真贯彻。他对内容设计的要求是:①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应“结合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重点地来处理,不能把经济史溶政治史和思想史于一体”。②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应“反映两者的适合或不适合”,不能象

经济学一样,只以生产关系为对象,“不包括生产力”。③对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的关系,既要反映它们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演变经过;又要反映外国资本和中国资本之间的“互相对立”和“互相依存”,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之间的“亦此亦彼”和“互相转化”。对写作方法的要求是:①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历史实际中得出结论,而不是从既定的原则中引出结论来。②坚持史与论“有机地结合”,历史与逻辑“辩证的结合”,不能写成有论无史的“史论”,也不能写成有史无论的“史料书”。③在断代上,坚持“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不能把小事当大事,把局部当一般”。《论社会主义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的初稿,是1970—1971年被关在“文革”的“牛棚”中写成,1972—1973年先后改了三次,在1978年炎夏中又再改一次,才付印。1983年春,此书初版快售完时,他为了“回答许多同志对本书的鼓励和批评”,又“乘再版之机”,“从头到尾,做了全面的修改”。他的另一本在1981年初出版的专著《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的《后记》也指出:“这部书并不是一口气写下来,而是由以前两部旧著和一篇学术论文编成的。”。两部旧著是指:1945年初版、1948年又修订再版的《中国经济的道路》和1957年写成初版、1962年又修订再版的《中国过渡时期国民经济的分析》。一文是指:1980年秋写成的《我国国民经济的变革与经验》。

作者对旧版《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修改,是从1982年冬开始,化了四年时间才修改完,并依次在1984年4月、1985年12月、1988年1月问世。广义政治经济学写作的重要性及其对象与方法,是恩格斯在他的晚年名著《反杜林论》中提出的。但是,在许涤新的初版本问世前,国内外却还未出现过这种书,因此,好些学者都称他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这当然对。但从作者反复表述过的写作动机和书的内容来看,则更应称之为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具体化的先驱。这种双重先驱作用,新版比旧版更突出。现按卷次,各举数例以供参考。

以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为对象的第一卷,新版对旧版的增改就有:①对原始公社分析,旧版因史料缺乏,用的是史学眼光;新版根据新发现的古文物,则用经济学眼光,着重分析了原始公社生产方式所包含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演变经过及其向奴隶制转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②新版也用新发现的文物说明:中国夏、商、周三代和古代的巴比伦、埃及、印度“都具有奴隶制的基本特征”,即:奴隶主“垄断了土地”、“占有奴隶的身体”和“奴隶主国家的出现”。但是,古代的东方国家,却有其与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的不同特点,即“土地国有”、“农村还保留一种公社的组织形式”和国家负责“治理水利”。并指出:东方奴隶制这种特点,就是马克思所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当作封建制或原始公社,都是错误的。③关于我国在明代开始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业工场之后,之所以仍长期停留在封建社会,新版也用更详实的史实说明是由于:封建领主或地主对农奴或农民的残酷剥削,小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实物地租很难转化为资本和土地的自由买卖又造成货币积累转化为土地。

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为对象的第二卷,新版对旧版也有如下重大增改:①旧版来不及分析的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变化,如资本售出的多元化、跨国公司的出现、经济一体化、殖民地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兴起等,新版都增加了评介。②对长期被人误解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提法,新版也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指出这一提法“是从社会科学的意义出发,而不是从生物学的意义出发的”。这一提法,同毛泽东说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说,从现实

上看,从战术上看,帝国主义仍是有力量的,是真老虎;但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是纸老虎”。③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的分析,新版不仅比旧版更详实,而且“为了使我国同胞,对解放前的旧中国有一个较为系统,较为概括的认识”,还用很多篇幅增设了《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一节,详实地论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形成和演变经过及其与我国的民主革命必然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

新旧版的写作动机,虽皆想从原始公社经济写到社会主义经济;但旧版第三卷因写于50年代初,为了突出中国化,却只以当时面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为对象。新版第三卷发稿于1985年,才改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对象。新版第三卷的《序言》说得对:旧版“第三卷是失败了的,因为过渡期很短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方式去对待的”。新版第三卷除也突出介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历和经验教训外,还提出了好些走在时代前列的主张。例如:在分析《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一节,在肯定斯大林对这一规律的表述(即:“用在高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有贡献的”的同时,也指出:“尚有可商榷之处,例如离开人的因素,即离开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政治觉悟去谈高技术的基础问题;例如离开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而谈最大限度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问题”。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节中,又提出了为往后实践所认可的如下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张:①国营企业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应分属国家和企业,“使企业成为真正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②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应“根据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减少指令性指标,增

加指导性指标,并充分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有效地促进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③“国家对国营企业从直接控制改为间接控制”,“间接控制的工具是税收、价格、信贷和利率等等”。

④对外对内都“实行开放政策,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⑤发展企业与企业、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横向联合”。⑥改革应“以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为目的”。⑦“企业要树立为满足社会需要而生产的观念”,“禁止偷工减料、掺杂掺假、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不法经营方式”。⑧“要把个人(或局部)利益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而以后者为前提;要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以来,而以后者为前提”。最后还着重指出:“鉴于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存在着艰巨性和复杂性,体制改革只能采取一个渐进的过程”。

当然,任何人的见解,都有历史的局限性的,新版《广义政治经济学》也难例外。例如,书中在正确反对把国有资本分给国有企业的职工当作他们的私人股本的同时,也反对用股份制来改造国有企业。但许涤新为这部巨著写的《初版序言》和《修订版序言》都反复指出,这“是一个大胆而冒昧的尝试”,期待大家的“指正和批评”。

开创编纂经济学工具书的先河

许涤新晚年在学术上的第二大贡献,是先后主编了三部具有系统性、又突出中国性和现代性的经济学工具书,即三卷本《政治经济学辞典》、一卷本《简明政治经济学辞典》和三大卷本《大百科全书(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组编,是许涤新到经研所初期全力以赴的工作,是我国出版史上第一部经济科学大辞书。上卷分导论、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三部分;中卷分帝国主义(含世界经济)、半封建半殖民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思想史四部分;下卷分社会主义经济和部门、专业经济两部分。万事开头难,“文革”刚结束就编这种大辞书,更难。许涤新之所以迎难

而上主编这部书,他在1997年秋,为了争取中国社科院和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的支持而写的报告和得到支持就立即召开全国性的筹编大会上的讲话中,都反复指出:这不仅因为这种困难充分说明编写此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建国28年还未写出,显然是我国经济学家积欠人民的一笔巨债;而且还因为我党在长期斗争中,特别是在建国后,已培养出众多富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编著经验的经济学家、学者,只要把他们组织起来,集思广益,各献所长,分工合作,就不难尽快还清这笔巨债。事实也这样,这部书在编写过程中,经过他的动员组织,先后提供过稿件和参加过编审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财经机关,就有二十多个省市、六十多个单位的数百名专家、学者。可以说,这部书是集当时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运用成果之大成。此书出版后发行之快且多,在出版史上也少见。1980—1981年三卷各出近30万册,到1982年底就售完。1983年各再版近50万册,也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又在1985年各再版近100万册。

《政治经济学辞典》初版虽发行很快,但也有读者来信说:此书分量太重,分类过细,查阅不便。因此,1981年春,他主编完此书的下卷时,就立即从参加编写人员中选出十余人,要他们以此书为基础,再编一本《简明政治经济学辞典》。在写作方针上,除仍要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突出中国性和现代性外,还特别要在“简明”二字上下功夫。对框架的设置和条目的释文,都要按初学经济学者的需要压缩,并做到通俗易懂。条目的排列也只按首字笔划多少,不再分九个部分。压缩结果,字数和条目各较《政治经济学辞典》减少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三卷也改为一卷。此书发行也快,1983年初版问世后,1985年就再版。

1981年11月,《简明政治经济学辞典》还未编完时,许涤新又应聘担任《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的主编,组织百余人编写。在编写规划上,

经过讨论,决定把全书条目首先分为七大类,即: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发展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思想史、部门经济学和专业经济学。这七大类的条目再按它们的从属关系,分为二至四层。全书共四百多万字,分两大卷出版。这部巨著由于篇幅大、分类细,许涤新又要求把条目写得“全”、“简”、“新”。大百科出版社还要求在条目中多加彩图(包括人物图像),全书条目拖到1986年才定稿,配图更拖到1987年才基本找齐。有些条目释文因与新的实践有联系,不得不在付印的清样上加以增补。因此,这部巨著也就拖到1988年3月才开始陆续出版。

理论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许涤新,在这种大环境下主编的三部辞书,自然也就一部比一部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这在三部辞书中相类似的条目释文中,尤其显得突出。例如,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政治经济学》中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条的释文,就对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所突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但由于存在着商品生产,必须利用市场机制,以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发展”;并主张给国营企业“有一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但由于当时的国营企业还未开始改革,因而释文仍有上述传统观念痕迹。如认为:计划经济所根据的经济规律“主要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简明政治经济学辞典》是在一些城市和企业开始实验经济体制改革时编写的,受了试点的启示,对上述传统观念又有新的突破。这就是书中设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两条释文,在肯定正在实行的“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同时,也指明“无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应研究市场供销情况,自觉利用价值规律,充分运用经济杠杆”。《大百科全书(经济学)》中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条目,是

写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之后,根据《决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更彻底否定了上述传统观念,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又是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必须遵守价值规律,利用市场机制”,“计划和市场的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

在这些辞书编写过程中,最令人难忘的是:1982年秋,当许涤新获悉《政治经济学辞典》初版书售完时,就想立即根据新的实践进行修订。但是,由于读者的需要量很大且急,出版社只同意对应修订的条目释文,按原来页码和行数进行修订,以便立即付印。这样做,离许涤新的要求当然很远。因此,《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在1986年付印时,他又想立即对大小政治经济学辞典修订,但因该书的再版数还未售完,只好仍按出版社的意见,再等一个时期。1988年初,他因病住院,当助编过这些辞书的同志去看望他时,他又郑重叮咛他们:一定要吸取新的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对这些辞书尽快修订。但由于这些同志都已离退休,经济研究所任务又多,他又很快告别人间,故这一心愿也就变成了未了的遗愿。

拓宽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领域

许涤新晚年的又一贡献,是拓宽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应用途径。这种成果主要有四:

(一)带头创建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和别的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边缘科学,并在应用上积极推广。这类成果又可分为三:一是经济学与生态学相结合的生态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在国外创建于60年代中期,当时我国已进入“文革”动乱时期,被打成所谓“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当然无法接触到这种著作。许涤新在“文革”后一看到,就非常重视,并力争把西方以资产阶级眼光写成这种著作,改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联系我国的实际来写。因此,1978年12月和1980年8月,他先后出席全国农业经济学会和

全国畜牧业经济学会的学术讨论会时,在发言中都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原理,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既要遵守经济规律,又要遵守自然规律,加强防治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1980年9月,他还用由他主编的《经济研究》杂志的名义,召开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组成的学术讨论会,决定建立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机构和学会。会后,经过他和志同道合者的反复努力,到1982年11月,我国第一个生态经济学研究机构,即所内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室,终于正式成立。学会则延至1984年2月才成立。他在著作上,除为这门科学写过一些专文外,还写成《生态经济学探索》一书,于1985年11月出版。生态经济学学会成立后,他又根据万里副总理在学会成立大会上的指示,组织并指导会员先后编出《生态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概论》、《农业生态经济学》三书,供有关大专院校增设的生态经济学课程当教材。同年下半年,他又应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之请,担任《中国自然保护纲要》主编。前述他主编过的辞书和专著,也皆设有有关生态经济学的条目或章节。二是带头恢复我国人口科学的研究。1978、1979两年,当“人多好办事”这种只看见人是生产者而无视人又是消费者的“左倾”思想,在人口问题上仍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许涤新为了落实早被人遗忘党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先后倡议并组织召开了两次人口科学讨论会。在第二次讨论会上决定筹组人口学会时,他被选为筹备组长。1980年秋,他还在所内创建了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中心。1981年中国人口学会正式成立并到他逝世前,他一直被选为会长。为了促进人口科学的宣传和运用,他还发表了好些专文;主编过《当代中国人口》一书,作为《当代中国》丛书之一出版;担任过《人口科学辞典》和《人口与优生》杂志的顾问;前面介绍过他主编过的辞书,也皆设有有关人口问题的条目。

(二)为了争取香港、澳门在我国开放中发挥

应有作用和如期回归祖国,在1980年8月,他就任在所内组建了一个港澳经济研究中心,并把它的机构设在广州,俾乃就近收集资料。同年11月,还指导该中心创办了《港澳经济》杂志。1984年4月,在他的动员组织下,又建立了香港经济研究会,并被选为会长。1983年7月,他带领国内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香港时,正碰上中英两国为香港前途进行谈判,英国妄图永久统治香港,除在谈判中提出所谓把主权和治权分属中英的怪论外,港府还为此制造了一场空前的港元危机。许涤新应邀到香港中华商会讲演时,就义正词严地指出:谁发钞票谁负责,港府有责任维持港币稳定。此论一针见血,震动全港。港府当天虽公开辩护说:香港是“自由市场”,他们不能“控制币值取向”;但真理毕竟战胜邪恶,在众怒难平情况下,港府仍不得不发表稳定港币的措施。

(三) 组建《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理事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服务。1984年夏,当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时,有几位市长向许涤新建议创办城市年鉴,俾乃传递信息和交流经验,并请他负责领导。他慨然承诺后,就立即上书万里副总理,万里立即批示:“赞成此举”。接着,他就邀请大城市的市长和一些经济学家共同发起创办这部年鉴,也很快得到两百多个城市市长的响应。同年12月,就在北京召开了年鉴理事会的首届会议。会中,除选他为理事长外,经过讨论还决定:为了及时传递信息、交流经验和为年鉴积累资料,除公开发行的年鉴外,还应出一本半月刊的内部刊物《市长参考》。年鉴和半月刊皆从1985年开始出版。

经济研究直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许涤新晚年在写作上,除致力于完成和完善前述的大部头著作外,每当面临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时,他无不挤时间调研,写成专文发表。并

先后编成《许涤新文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的问题》、《许涤新选集》三书,分别在1980、1982、1985三年出版(以下依次简称为《文选》、《问题》、《选集》)。三书所收专文,除前二书各有几篇写于这个时期以前外,余皆为晚年之作。这些专文,充分体现了他在写作上力争做到更及时、更直接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精神。

(一) 总结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和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三书所收专文,无不涉及这个问题。其中,好些总结还走在时代的前列。例如,《文选》所收《遵守价值规律搞好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发表于封闭集市贸易等错误做法还在风行的1978年春。《选集》所收1981年秋发表的《建国以来国民经济的发展与顿挫》,就较早、又较系统、较详实地总结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和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也是《选集》所收、发表于1981年12月的《论社队企业和农工商联合企业的作用及其关系》,则是对这年下半年才出现的农工商联合经营和农工商联合企业大加赞赏,认为“这是对过去若干年来‘左’倾政策严重地束缚农业生产的重大突破”。

(二) 社会主义建设应遵循的客观规律。三书所收文章,对这一课题的贡献,不仅表现在篇数多,而且更表现在:①既强调要遵守社会主义经济特有的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也强调要遵守社会主义和别的社会共有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和价值规律。例如,《选集》所收、1979年4月发表的《论“穷过渡”》就指出:“‘穷过渡’不仅破坏了农业生产力,不仅违反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要求,而且也破坏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要求”。②既强调要遵守经济规律,也强调要遵守自然规律和人口规律。《问题》一书的《序言》就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损害了客观存在的生态平衡,那也没法不受到自然的惩罚。”《选集》所收、

1981年4月发表的《对于人口科学几个问题的看法》也指出：“人口增加如果不实行计划化，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如果失去平衡，那就很难谈到扩大再生产。”^③即强调遵守与生产发展息息相关的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人口规律，也强调要遵守生产力自身特有的规律。《文选》所收、1979年2月写成的《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与发展》就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特点和规律”，“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不仅要提高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水平，而且要提高劳动群众的生产技术水平；就不仅要有先进的技术设备，而且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④既强调上述各种规律自身的客观性，也强调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的客观性。《选集》所收、1980年11月发表的《实现四个现代化与生态经济学》就指出：“生态平衡规律同经济领域中的一切规律是息息相关的”。前引《对人口科学几个问题的看法》也指出：“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是分不开的”。

(三) 社会主义建设应采用的经济体制。三书所收文章，也多涉及这一课题。有些主张还提出较早，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这些主张主要有：^①前引《论“穷过渡”》一文就指出：“否定‘穷过渡’，就必须否定与农业生产不相适应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而代之以能够调动社员积极性的生产责任制”。^②《选集》所收、发表于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1981年6月的《对于特区经济的认识》，在指出特区经济的“特点”是“以市场调节为主、以计划调节为辅”后，谈到“特区的经济作用”时，就着重指出：“可以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可以作为掌握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学校”。

(四) 坚持和捍卫四项基本原则。三书所收文章，也多与此有关，好些文章连题目也表明为此而写。例如，《选集》这种题目就有11篇，即：1979年4月写的《论“穷过渡”》、《克服“左倾”思想影

响、稳步地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81年3月发表的《学习周恩来同志的〈新民主主义建设〉》、7月发表的《论社会主义制度》、1982年7月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笔记〉》、1983年3月发表的《论〈资本论〉的生命力》、7月发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方针——学习〈邓小平文选〉中的经济思想》和9月发表的《马克思对待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科学态度》、1984年12月发表的《马克思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学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体会》、1985年12月发表的《再论〈资本论〉的生命力》。《问题》一书的《序言》也指出：“此书所收论文，都是为了清除‘左倾’指导思想在经济领域内的干扰”和“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怀疑”。都是为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上述《文选》所收此类文章第八篇的学习心得，还是发表于《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出版后不到一月发表的，并在题目中就称此书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方针”，文中又着重指出：“这部著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而又以伟大的共产主义为目的。这部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

还应指出的是：三书所收论题大致相同的文章，也充分体现了作者与时俱进的精神，即后写的都比先写的更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许涤新除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外，晚年还热衷于用文学体裁写回忆录，把自己熟知又鲜为人知的革命史实和人物写出来，帮助人们认清过去，正确地面向将来。其中，《百年心声》、《永怀集》和《风狂霜哨录》就是其代表作。这些著作由于非经济理论问题，故不赘述了。

(责任编辑：蒋少龙)